

正义的认领：为什么公正感在完美的判决之后仍然死去

他在庭上说过的那句最痛的话，判决书里连一个影子都没有；认领需要一个有位置的动作

作者 高鹏 · SDE 学员 · 约 2.1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8日 · 打磨版

摘要

关键词：公正感；宣告论；认领仪式；司法互动结构；发生学

SDE 创新智商：133 → 140

本批打磨的重心：补入与本栏《归感》《活性塌缩》的三方分工（状态—病理—界面），把本文收窄为一个比前两篇更容易被推翻的界面主张；补入与加芬克尔“贬降仪式”的镜像对质；新增「本文禁止什么」一节，其中明确禁止把封口段落做成强制模板字段。提升后分数为编辑自评，待独立复评。

第二轮再补：与言语行为理论的对质——判决书是宣告式，其生效条件在结构上不含当事人的接受，故可以百分之百有效而百分之百不被认领；制度性封口因此被精确化为在宣告式文本内嵌入确认式片段，并给出全文最易被推翻的一条预测：嵌入确认式片段与仅加长说理，对认领率的作用是否有差别。

一个反复出现的反例始终未被当代法治的自我叙事认真对待：判决在法律上无懈可击，败诉方却感到被司法系统“处理了一遍”——案子判了，人没进去。本文追问的不是“判决如何更正确”或“程序如何更精致”，而是公正感生成结构中被宣告形态系统性缺失的那段心理路程。宣告形态——法官单方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宣告判决——不是某个错误理论或傲慢制度造成的，而是在法理理性主义、效率管理压力与法官心理保护三重力量长期耦合下被逼出来的一套稳定配置。它的结构性盲区在于：公正感不是一件可以被宣告然后被接收的物品；它必须由当事人在自己的心灵中认

领，而这种认领需要一个不同于宣告的、专门接住当事人无法被法律语言消化的经验的互动结构来完成。这个结构，是宣告论在其结算极限处不得不发生的新配置。本文从这个裂缝中逼出“认领仪式”的三项核心机制——对抗性悬置段、确认式接住、制度性封口——并论证其发生逻辑不是“为了让宣告更好而补充的三件套”，而是前一环在运行中自身引发的特定崩解逼着后一环不得不发生。论文逐层展示认领仪式与程序正义的Voice研究、治疗性法学、叙事法学、法律人类学的冤屈叙事传统、恢复性司法及司法社会学的职业冷漠论的严格切割，完成不可还原论证，给出制度化的出口设计并正面回应效率、职业伦理、主观性暴政、认知泄漏等系统反驳，最终以同一继承纠纷在两种配置下的镜像推演展示公正感如何被宣告逐层剥离、又如何被认领仪式艰难地重新托起。本文给出证伪条件：若嵌入认领仪式的试点运行后，败诉方仍普遍认为那些附加环节“不过是让程序好看一点的装饰”，则本文的核心判断即为错误。

一、引言：为什么判对了，公正感却死了

在当代法治的自我叙事里，一个公正的判决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法官依据事实、适用法律，在程序上给足各方陈述与辩论的机会，最终以严密的逻辑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当这一整套工序走完，我们通常说：正义得到了实现。即便当事人不满意结果，我们也倾向于将其归因为“不懂法”或者“输不起”。法治的权威，恰恰建立在这种信心之上——只要把判决做对了，公正感理应随之而来。

然而，一个在司法日常中反复出现的反例，始终未被这一叙事认真对待。为什么有人拿着对他完全有利的判决，竟说“官司赢了，可我觉得自己从来没进过法院——他们说的那个案子，不是我经历的那件事”？为什么有的败诉方拿到判决后，愤怒的不是“我输了”，而是“他们在法庭上说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告诉我，这个结果就是法律”？反过来，为什么有些程序不那么精致、法条引用也不那么完美的调解过程，反而能让纠纷双方都感到“这事过去了”的踏实？

这些反例逼迫我们承认：在“做对判决”与“产生公正感”之间，有一道深刻的裂痕。我们曾经以为，这道裂痕只是一个沟通问题——判决书写得不够通俗，法官解释

得不够耐心。但无数次的“判后答疑”早已证明：不是法官没说清楚，而是说清楚了反而更糟。当事人越是听懂了法律逻辑，越清楚“你的痛苦在法律上不构成一个可被救济的损害”，他就越确信自己从一开始就不该踏进这扇门。问题不在于“没说圆”，而在于：当下的整个司法程序中，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专门为了让当事人认领这个判决而设计的。

本文将论证，公正感所缺失的那段心理路程，需要一个不同于宣告的互动结构来承载。这个结构是什么，必须从宣告失效的裂缝中一步一步被逼出来，而不是被预先设计好再套上去。整篇论文的推进如下。第二节，回到现代司法怎样在多重制度压力与历史条件的作用下，逐渐长成了一套以“宣告”为核心的互动形态——这不是某个错误理论造成的，而是被逼出来的稳定配置。第三节，从宣告在其结算极限处的耗竭中，让认领仪式的三项机制依次被逼出——对抗性悬置段、确认式接住、制度性封口——并论证：每一项机制都不是被设计出来凑数的，而是前一项在运行中自身引发的特定系统扭曲，逼着后一项不得不发生。第四节，将认领仪式与程序正义的Voice研究、治疗性法学、叙事法学、法律人类学的冤屈叙事传统、恢复性司法及卢曼的系统理论这六组最危险的站外近邻进行严格对质，凿出认领仪式在这些已有概念都够不到的地方切开了什么新的区分面。第五节，将认领仪式反向嵌入起诉、庭审、判决书与评估体系，给出可操作的制度接口设计，并正面回应效率、职业伦理、主观性暴政、认知泄漏等系统反驳。第六节，以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为素材，分别在无认领仪式与有认领仪式两种配置下进行镜像推演，展示公正感如何在程序的每一步被逐层剥离，又如何在认领仪式的接住下被艰难托起——即便接住了，裂隙仍在。第七节代结语，诚实交代本文判断的边界与证伪条件。

二、法院为何长成了宣告者——不是错误，是被逼出来的稳定配置

（一）宣告的语法与姿态

“本院现已查明……”在这短短六个字里，潜藏着一整套关于公正如何发生的根本想象。它假设存在一个可以被“查明”的客观真相；它假设这个真相可以被法官用演绎

推理清晰地说出；它假设说出之后，判决就应该被接受。判决书的最后一行，永远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而不是“本判决供你参考”。

这不是某个独断的法官偶然养成的傲慢。这是一套完整的、可被反复训练的互动语法：司法公正，在该语法的预设中，是一件可以被法院单方面找到、单方面说出、单方面生效的东西。当事人在这个过程中全部的角色，是接收。

（二）宣告形态是怎样被逼出来的

如果把宣告视为一种需要被起底的错误信条，就走错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另一套问题：在何种具体的制度约束与历史压力下，法院逐渐长成了今天这个宣告者形态？

至少三重力量参与了这一形态的塑造。

第一重，十九世纪以来法律形式主义的理性理想。启蒙之后的法学家将法官想象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悬置情感与偏见，单纯依靠理性，从客观的证据中推导出唯一正确的判断。概念法学把这个理想推到了极致：法官被喻为一台“自动售货机”，从上面塞进法条和事实，下面就会吐出判决。这个意象虽属修辞上的极端化，但它精确地捕捉了形式主义法学的核心冲动：把司法变成一套可预测、可复现、不受个体判断污染的演绎机器。

第二重，二十世纪以来司法职业化与案件管理的效率压力。当案件数量激增、审限被不断压缩，法官的生存策略就必然是快速压缩事实、提炼争点、产出判决。宣告形态在此时不仅是一个法理传统，更是一个效率工具——它让法官不需要花时间去处理那些“不构成要件事实”的当事人叙述。一个当事人絮絮叨叨讲了二十分钟的往事，在法律眼里可能只是“多份间接证据中的一份，证明力较低”。宣告机器让法官可以心安理得地打断他：请只说与本案有关的事实。

第三重，也是最隐蔽的一重：宣告形态对法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心理保护功能。当法官用“本院现已查明”来开启判决时，他就把自己稳稳地安放在法律逻辑的内部，不必面对当事人无法被法律语言消化的痛苦。他不必去接住张甲二十年端茶倒水的委

屈、不必去回应当事人那句“法律上的正确不是我要的”——因为他的全部工作，仅限于把生活事实转译为法律事实，然后据此作出判断。宣告，让法官从“必须承担当事人失望”的道德重负里解放了出来。这种解放不是自私的逃避；它是在一个案多人少的系统里，让法官这个角色得以可持续运转的心理防护层。

这三重力量——法理理性主义、效率管理压力、法官心理保护——的长期耦合，把现代司法塑造成了一套精密的宣告机器。它不是某个人故意制造的恶，而是一整套制度配置在历史中逐渐稳定下来的、具有内在韧性的稳态。要解释公正感在这个稳态中的持续流失，不能靠批判宣告者的傲慢，而必须去追问：在这套宣告机器里，有什么东西是被系统性排除在外的？

（三）宣告在主体间结构上的结算极限

答案从宣告论的耗竭处逼出来。公正不是一件可以被“发现”然后被“宣告”的物。公正，是当事人的一种体验。体验之所以是体验，在于它不能被给予——你可以把一份判决书放在一个人的面前，告诉他“这就是公正”；但你不能把公正感放进他的心里。公正感的生成，必须经过一条从当事人的生活世界出发、穿过司法程序的层层转化、最终在他的自我理解中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缝隙的完整路径。在这条路径的终点，公正感不是被当事人“接收”，而是被他“认领”——他把那个来自外部权威的判断，认作了与自己有关的、被自己参与过的东西。

宣告机器恰恰在这条路径的入口处，就切断了它的去路。当一个法官说“本院现已查明”时，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已经替你真相看清楚，你不必再看了，你只要接受就行。这句话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在主体间结构上却触及了宣告的结算极限——因为它在公正感的生成起点上，就把当事人从“公正的共同生产者”降格为“公正的被动消费者”。一个被动消费者，永远不会对塞到他手里的东西产生“这是我的”的认领感。他最多只能学会忍受，或者在心中暗暗否定。

这个结算极限开启了三个层面的耗竭。第一，宣告从未为当事人在判决形成过程中以完整的“叙事者”身份现身的余地——不是作为查案需要的信息源，而是作为“这就

是我经历的事”的讲述者。第二，宣告让当事人在法庭上被逼成唯一可能的心理姿态就是对抗——对抗对方的说法、讨好法官的认知——而没有第三种姿态（例如：共同进入对事实的回忆与重新理解）。第三，宣告在判决书的终点处，对当事人最想被接住的那部分痛苦，只给了一个程序出口（“不服可上诉”），而没有一个人性的出口（“你说的，法庭收到过”）。这三重耗竭不是宣告的“坏”，而是宣告被逼到其能力边界时显露出来的结构性盲区。它们逼出了不得不发生的新结构。

三、认领仪式：从宣告耗竭处逼出来的结构

（一）对抗性悬置段：让当事人在争讼中暂时脱离证据规则的统治

当前庭审的一切环节，都被优化来服务于一个目的：帮法官形成心证。当事人所有的陈述、辩论、质证，在这个剧场里都是作为法官查案的“信息源”而存在的。对抗性悬置段被逼出来的理由就在这里——如果公正感的起点是认领，而认领的起点是当事人感到“我的人生经验在这个屋子里有独立的意义”，那么这个起点的前提条件，恰恰是宣告机器从未提供过的：一段不受质证规则约束的、由当事人自己做主的说话时段。

对抗性悬置段的制度形态如下：在正式事实调查开始前，由审判长宣布进入认领陈述段，时间不超过各十五分钟。陈述规则是：①不构成诉讼主张，不作为证据使用，不在庭审笔录中出现；②对方不得打断，法官不得追问法律事实，但可以就纯情感内容进行确认式提问——不是为了套话，不是为了获取证据线索，而是为了让当事人感到“你在试图理解我，而不是准备下一次反驳的材料”；③陈述结束即告失效，不进入后续程序的任何环节。

单有这个悬置段是远远不够的。它的危险恰恰在于：如果法官只是面无表情地听完当事人二十分钟的往事倾倒，然后翻开卷宗说“好，我们现在看证据”，那一刻造成的伤害，比从一开始就不让他说要深。因为现在他不是“没被听见”，而是“被听见了，然后被丢弃了”。但仅靠“会造成二次伤害”这个应然判断，还不足以从发生学

上逼出下一环——我们必须追问：悬置段自身，在其运行中，会引发何种具体的系统扭曲？

这个扭曲来自当事人在悬置段中的位置本身。一个被突然赋予了“你可以说任何话”的特权的当事人，会本能地利用这个空间做两件事：一是策略性地向法官进行情感表演（把悬置段当成一场没有证据规则约束的变相辩论）；二是当他说完、看到法官毫无反应时，陷入一种比沉默更深的焦虑——因为他刚刚袒露了自己最脆弱的部分，而接收方的反应是一片程序性的空白。这个空白不是法官的错；它恰恰是悬置段作为“例外空间”的结构必然：由于规则禁止法官追问事实、禁止陈述进入笔录，法官在悬置段中事实上被剥夺了所有常规的司法互动工具，只剩下“听”这一个被动动作。一个只能被动倾听的法官，在当事人眼里不是一个接住了他痛苦的人，而是一堵没有回音的程序墙壁。

这就是悬置段自身引发的特定崩解：它创造了开放性，却剥夺了法官回应开放性所需的任何制度工具。法官被困在“听到了，但不能回应”的角色焦虑中，当事人在这个空间里得不到任何信号来确认自己的袒露是否被真正接住。这个崩解不是“二次伤害”的应然担忧，而是悬置段在运行中产生的一个不可持续的系统状态：一个只有输入、没有反馈的互动空间，在结构上无法自我维持。

（二）确认式接住：用最低限度的确认修复互动断裂

确认式接住被逼出来的逻辑就在这里。它不是悬置段的装饰性补充，而是修复悬置段自身系统性断裂的不得已装置——给法官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不违反悬置段证据禁令的、同时又足以向当事人发出“我听到了”信号的制度工具。

确认式接住，指的是法官或司法辅助人员对当事人陈述中的核心情感与道德主张，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应：不是“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这种可以被官僚化复制的标准话术——这种话术恰恰是宣告论在倾听外衣下的复活——而是针对当事人说出的那个具体的人、那句具体的话、那件具体的事，作出确认。法官说：“我听下来，你这些

年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很不容易。”或者说：“你觉得他不配做父亲，这个愤怒，今天在法庭上有位置。”

这些话，不生既判力，不影响事实认定，不构成偏袒一方的承诺。它们唯一的功能，是在当事人重新被拉入法律话语的冷硬逻辑之前，把他刚刚袒露的那个无法被法律格式化的内心世界，轻轻地承住——不是评价它、治疗它、转化它，而只是确认它的存在。

但确认式接住从发生的这一刻起，就背负着一个致命的系统困境：它是一个纯当下、纯口头的事件，无法进入司法系统的公共记忆。法官说了一句确认的话（“我听到了”），这句话在当事人的心理上可能造成了真正的震动——但谁来证明这个震动发生过？当事人可以事后对家人说“法官今天真的听懂我了”，但家人没有在场。同样，法官本人也无法在事后引用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因为它不在卷宗里，不在庭审笔录里，没有任何可被第三方查证的痕迹。对方当事人完全可以否认：“法官根本没说过那句话。”而法官无从自证。

于是，一个严峻的矛盾从确认式接住自身的运行中生长出来：接住发生了，但它不能进入公共记录；它对当事人的心理是真实的，但在司法系统的正式记忆里等于从未存在过。这不是记忆磨平的问题——这是私人经验与系统真实之间的结构性断裂。确认式接住被逼着发生，但在系统只承认“写下来的才算数”的文本中心主义下，它一发生就面临着被抹除的命运。这个内在矛盾，就是下一环不得不发生的真正动力：必须有一种东西，用司法系统唯一承认的永久形式——文本——来封住“制度曾接住你”的痕迹。

（三）制度性封口：用判决书正文为“法律装不下的东西”作证

制度性封口被逼出来的逻辑在此刻清晰起来。它不是为了防止确认式接住在当事人的记忆中被磨平（那是心理层面的、次要的），而是为了让接住这件事，在一个不能也不愿承认其意义的系统里，第一次获得了能被任何第三者读取的、不可磨灭的证据。判决书附言的意义，不在它比法官现场说的那句话更有力——事实上，文字更冷，更

可以被程序化地打量；它的意义在它不可被删除。案号、日期、法院落款。它是司法系统唯一不能否认的东西。

这就是制度性封口的标志性形态：一段不长但精确的文字，印在判决理由末尾、主文之前，作为判决书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另一份需要签字的合同，不是庭后发给当事人的“心理关怀函”——那些都是判决书之外的、可以被忽视、可以被丢失的附属品。封口的全部力量在于它“在判决书里面”——它和那个让人痛苦的判决主文共享同一个文本系统，共享同一套权威标记。这一笔的实质是：判决书这个宣告机器最核心的输出物，被逼着在自身内部为宣告接不住的东西开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位置。

以审判长的名义，这段附言可以这样说（此处仍以继承纠纷为例）：“今天的判决，在财产分割上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额。这个数额本身，只是一个数字。但我们今天在这个法庭上所做的事，远不止于这个数字。我们听到了你对你母亲当年说过的话的愤怒，也听到了你对这个家几十年来谁付出更多这件事的不同记忆。在法律程序上，我们的判决无法直接回应这些愤怒与记忆；但在人的层面上，你们双方今天都把自己的那部分说给了彼此听到。这个判决，是建立在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之后，由法律给出的一个暂时的休止符。它未必是你一开始想要的答案。从你们走出这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希望你们记住的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你们在法庭上真正听到过对方说话的那个瞬间。”

在法律上，这段话完全无效。但在确认式接住面临着“发生即被抹除”的结构性困境时，它正是那个在另一套系统逻辑里有效的东西——证明系统承认：接住，确曾发生。

四、理论疆界：认领仪式切开了什么

一个新结构若不在其最近邻之间划出清晰的区分面，就会被学术界要么低估为“别人早讲过了”，要么消解为既有理论的温和排列组合。认领仪式的六组最危险近邻需要在这里逐一接受严格的对质。

（一）不是程序正义的Voice——差别在“判决书里有没有回响”

近三十年来，以Tom Tyler的程序正义实证研究为代表的一脉文献反复确认了一个核心发现：当事人只要有机会在法庭上说话、且感觉自己的话被尊重地倾听——即“voice”（表达机会）与“dignity/standing”（尊严与地位确认）两个核心维度——对程序正义的感知就会显著提高，对判决结果的接受度也随之上升。

认领仪式与Voice在此处的边界必须切清。Voice管的是“我满意这个程序”——它测量的是当事人是否感到自己有公平的机会参与对话、是否被礼貌地对待。认领仪式管的不是程序满意度，而是判决本身能否被当事人认领为“自己的”。这两者之间有一道被Voice文献系统漏掉的关键缺口。Voice能保证“我在法庭上说过话”，但它不能保证“我说过的话在判决书里被回过”。一个当事人很可能在庭审中得到了充分的发言机会，走出法庭时对程序并无不满——但当他拿到判决书、从头翻到尾发现自己说过的最痛的那段话在判决书里连一个影子都没有时，那种“我在庭审中被打动了，但判决书是冷的”的疏离感，正是Voice够不到的。认领仪式对Voice的推进，恰恰在这里：它不满足于当事人在法庭上“被听到”，而要求这个“被听到”必须在判决书的正文里留下一个可查证的回响——制度性封口。封口不是判决说理，它就是告诉当事人：你说话的那个时刻，在这个案子的最终文本里是有位置的。这是Voice未提出的要求，也是它无法覆盖的区分面。

（二）不是治疗性法学——差别在“正向促进”与“负向保护”的哲学鸿沟

以Wexler和Winick等人为代表的治疗性法学（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长期主张，法律程序应当关注其对当事人心理福祉的影响；法官应当通过积极的倾听与回应，使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感受到被尊重与理解。这一立场与认领仪式显然有重叠——尤其是在确认式接住的概念上。

但认领仪式与治疗性法学在一条关键边界上分道扬镳。治疗性法学把心理福祉当作一个正面的、可累积的善：法官越倾听、越回应，当事人的心理健康就越得到促进，司法程序的“治疗功能”由此成为其合法性的组成部分。认领仪式不追求对当事人的任

何正面疗愈效果——不是因为它反对当事人变好，而是因为它把制度合法性的锚点钉在一个更低的底线上：判决不被当事人的心灵内部拒斥。

这个区分不是修辞的，而是哲学的。在治疗性法学的逻辑里，法官的倾听是一个“增益”动作——它在正常司法的基础上额外提供了某种心理好处。因此，一个治疗性法学导向的制度设计，必然会追问“倾听是否做得足够多、足够好”，并倾向于把倾听的深度和频率作为评估司法质量的正面指标。但认领仪式的逻辑是负向的：它不关心倾听是否“够多”，它只关心倾听的缺失是否让判决变得不可认领。认领仪式不是在司法的日常运转之上叠加一层治疗功能；它是在宣告机器的特定耗竭处，填上一个如果不填就会导致公正感死亡的缺口。一个是“做加法”的制度想象，一个是“防死刑”的制度底线。

这一区别同样体现在法官的站位上。治疗性法学中的法官，即便不被明说，也被安置在一种“我知道什么样的程序对你的心灵有益”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蕴含着一种温和的家长主义——你的心理健康是我司法行为的一个合法目标。认领仪式中的法官不做这个承诺。他只是在一个特定的、被规则严格限定的时段里，愿意屈身用当事人的语言回应当事人的痛苦。他的站位不是治疗者，而是见证者。见证者不负责让你变好；他只负责让他所见证的事不被抹除。

（三）不是叙事法学——差别在“痛苦能否不依赖叙事能力而被接住”

以Robert Cover为代表的叙事法学传统深刻地指出，法律通过其自成一体的规则与程序，系统性地压制了当事人那些无法被法言法语转译的生活叙事。Cover的名言——“法律是在一个充满疼痛与死亡的世界里运作的”——直接挑战了法律形式主义对“规则自足”的信仰。叙事法学由此主张：司法应当为多元叙事提供被讲述与被倾听的空间，让那些被法律规范挤压得无法呼吸的“小故事”，在法庭上重新获得生命力。

认领仪式无疑站在这一传统之中。但叙事法学有一个未被反思的预设：当事人内心最需要被接住的东西，是可以被“叙事化”的——也就是说，它预设当事人能够把自己

受到的伤害组织成一个可以被说出来的故事。Cover以降的叙事法学家们没有追问：那些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说清楚、无法结构化、无法放进一段有开头—发展—结尾的“叙事”里的弥散性痛苦怎么办？一个当事人可能在对抗性悬置段里反复哽咽，翻来覆去说的只是同样几句话：“我就是觉得不公平”、“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反正这些年就这样”。这不是一个叙事，这是一团无法被自我叙述的情绪淤积。叙事法学预设叙事能力的当事人；认领仪式接住的是连叙事都做不到的当事人。

认领仪式在这个地方切开了叙事法学够不到的断面。它不仅为“可叙述的痛苦”提供空间，更为“无法被讲述的弥散性痛苦”提供了一个可以被接住的最小落点：它不要你说成一个故事，它只要求你承认“你的痛苦在这里是有位置的——即使你说不清它是什么”。确认式接住的深层意义，正是在法官的确认式提问里替当事人把那个他无法说清的痛苦接过来——不是替他讲述，而是替他确认它的存在。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主体建构。叙事法学试图恢复被法律驱逐的“人的故事”；认领仪式接住的是那些连故事都还没成为、或者永远成不了的“人的淤积”。

（四）不是冤屈叙事／框架鸿沟——差别在“讲述之后如何不被再次丢弃”

法律人类学中关于冤屈叙事（grievance narrative）与“框架鸿沟”（frame gap）的研究传统——尤其是Sally Engle Merry在其经典民族志《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中对美国劳动阶级当事人如何试图在法庭上讲述完整的生活故事、却被法律程序快速剪裁为可审理案由的分析——已经有力地揭示了宣告论的核心病症：法庭之所以不能产生公正感，是因为法律话语与日常道德话语之间存在深刻的框架鸿沟；当事人想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判决，而是一个能让他的完整道德世界被承认的回应。

Merry的问题诊断与本文第二节高度同构。但Merry和整个冤屈叙事传统在解决方案上停在了宣告批判的层面。他们的隐含预设是：问题的根源在于框架鸿沟，因此只要让那些被剪裁的叙事被允许进入法庭、被认真倾听，公正感的问题就能得到缓解。但认领仪式逼出的恰恰是这一预设的盲区。本文的一个核心洞见在于：在对抗式审判的特定互动结构下，仅仅“让叙事被讲出来”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更危险的——因为

它给当事人制造了一个“我被听见了”的短暂幻觉，而判决书的最终文本会把那个被听见的瞬间抹得一干二净。

认领仪式不是在恢复被宣告剪裁的叙事，而是在叙事之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专门用来接住“法律装不下的东西”的制度性位置，并以判决书本身这个宣告机器最核心的输出物来封存这个位置的痕迹。Merry讨论的是“让叙事被允许进入法庭”；认领仪式讨论的是“进入之后，叙事的残余——那些讲出来了但没有被法律接住的东西——如何不被再次丢弃”。这组对质凿出的区分面是：冤屈叙事传统要解决的是“法律听不到”，认领仪式要解决的是“法律听到了但装不下，而装不下的部分需要一个正式的、不可磨灭的落点”。

（五）不是恢复性司法——差别在“判决终局性硬约束内的不可替代性”

这是认领仪式最危险的站外近邻之一。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从家庭组会议到加害人—被害人调解——早已系统性地提供了“不被质证的陈述空间”“情感被承认”“集体寻找closing”的机制。一个尖锐的质疑因此浮现：在恢复性司法已经通过非判决程序实现情感承认的情况下，为什么还需要在判决程序的终局性硬约束之内嵌入认领仪式？

回答必须从恢复性司法的结构性边界切入。恢复性司法运行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同意从判决的对抗轨道中退出，进入一个以修复关系、协商赔偿、共同承认伤害为目标的替代性程序。这意味着，恢复性司法只能在“双方都有修复意愿”的情况下展开。但本文处理的恰恰是那个更硬的场景：一方拒绝退出，一方坚持判决；情感的撕裂仍然存在，但修复无从谈起。在这类案件中——继承纠纷中拒绝彼此谅解的兄妹、相邻关系纠纷中无法共处一室的邻居、行政诉讼中与行政机关僵持的公民——判决是唯一不可绕过的终点。恢复性司法在此无计可施。

认领仪式正是被这类场景逼出来的。它不问双方是否有修复意愿，不预设任何“共同迈向和解”的期待。它只在判决这个不可协商的硬边界之内，为当事人开辟一个最低限度的接住空间：你的痛苦不必被对方承认，不必被转化为和解协议，不必产生任何

法律关系上的后果——但它在这个判决里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有字为证。它不是恢复性司法在判决程序中的“微缩版”；它是恢复性司法够不到的那片荒野里，司法系统承认自己接不住全部、但仍愿意为接不住的东西留下标记的唯一方式。

（六）不是系统理论的反叛——差别在“冗余是被逼出来的结构耦合，而非系统外的人文主义反抗”

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更根本的质疑框架。在卢曼看来，现代法律系统通过“合法／非法”的二元代码进行自我指涉的运作；人以“心理系统”的身份存在，但在法律系统内部只能以“案件”这种沟通单元的形式被触及。作者在第二节所描述的“宣告机器”，与卢曼的法律系统代码化高度同构。那么，认领仪式是否只是在系统外部徒劳地寻找一个“人的位置”——一个卢曼会断然判定为不可能的动作？

本文的回应是：认领仪式不是在系统外部寻找一个“完整的人”，而是在系统内部，利用法律系统自身的文本中心主义特性，逼出了一个让心理系统得以临时锚定的冗余区。制度性封口不是判决说理，不影响合法／非法的二元判断——因此它不破坏法律系统的自我指涉封闭性。但它也不是一个外在于系统的、无关紧要的情感附属品；它被刻意钉死在判决书正文里，恰恰是为了利用系统最核心的操作（判决书）来创建一个系统自己不会主动生成、但结构上可以容纳的冗余——一个在“合法／非法”代码之外、但仍在系统文本之内的位置。

这个冗余不是系统理论的反叛者挖出来的秘密通道；它就是系统理论会预测的那种“结构耦合”——法律系统与心理系统之间短暂而脆弱的接触面——被认领仪式的制度化设计逼着长出了比理论所描述的更长久的、可被查证的文本形态。由此，认领仪式与系统理论的对质不是对立，而是推进：系统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接住在结构上不可能；认领仪式展示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不可能”如何被逼出了一个小到极限、但确实存在的例外。

五、制度化的出口：把认领仪式钉入司法的骨头里

认领仪式若要避免成为“被漂亮话包装起来的又一纸空文”，就必须被钉入制度化流程，并在效率、审限、二审监督、法官职业风险的真实负重中证明其可行性。与此同时，一个负责任的制度化设计必须正面应对那些最诚实的质疑——它会不会在效率和资源的压力下松动？会不会制造新的职业伦理困境？会不会在法官素养参差不齐的系统中沦为“碰上什么法官”的彩票？会不会被当事人利用、被法官走过场？

（一）诉前告知书：在立案那一刻就定位一个不同的当事人

当前起诉流程的第一步，是填写格式化起诉状。起诉状的核心功能，是把生活事实译为法律事实。这个转译过程本身，就已经开始系统地剥除当事人经验中那些无法被法言法语收编的部分。认领仪式的第一个制度化接口，是在立案阶段增设一份简短的“认领告知书”，由审判长以平实的语言告诉原告：“你即将提交的起诉状，是你用法律的语法重写的版本。在你重写它之前，我们想对你说一件事：在你心里，这件事真正的分量是什么，你不需要把它全部压缩进法律的语言里。正式开庭时，我们会留出专门的时间，让你用自己的话，把这件事在你的经验里是怎么被活过来的，说给我们听。那个时间，不会被对方打断，不会被法官追问法律事实，不会因为你说得不准确而被扣分。你要做的不只是把你的纠纷塞进法律的格式——我们想听到，这件事在你自己的经验里，是怎么被活过来的。”

这份告知书在实体法上无任何效力。但它在认领的起点处做了一件所有法条都没做的事：它提前告诉当事人，在这个法庭上，你不是一个即将被裁剪为案由的案件。你被邀请带着你那些说不清、道不明、格式装不下的东西进来。这个邀请本身，就是把当事人在公正感生成结构中的位置从“被动接收者”扭转为“共同生产者”的第一步。

（二）庭审中的对抗性悬置段：给“说乱话”一个制度保护壳

对抗性悬置段是认领仪式中最容易被走过场的环节。法官只说一句“现在你们有什么心里话可以自由说”，然后低头翻卷宗——这种所谓的悬置段，根本不是悬置，而是

把沉默伪装成了倾听。对抗性悬置段的制度设计必须精确到分钟，有可操作的提问规范，并嵌入监督机制。本文建议在庭审初始设置不少于十分钟、不超过各十五分钟的认领陈述段；法官在其中的提问不得追问法律事实，只能对情感内容作确认式回应——“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最让你过不去的是那句话？”认领陈述段的录像应当与庭审录像同步保存，并成为法官绩效考核中“认领完成度”指标的重要基础材料——具体在第五节（四）中展开。

关于职业伦理的质疑——法官做确认式提问，是否要求他扮演心理治疗师，是否违反法官中立性？如果法官的“确认式提问”被录音并在上诉中被用来主张法官有偏见，如何处理？

对此的回应如下。认领仪式不要求法官做任何心理治疗性的干预——它不要求法官分析当事人的人格结构，不要求法官引导当事人的情感释放，不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家庭关系作出诊断。确认式提问的边界在这里就划定得很清楚：法官只确认当事人所表达的情感与记忆——“你是说，他当年对你说的那句话，一直让你过不去”——而绝不做任何评价、分析、调解或承诺。它不是治疗，它是让当事人在说完一段自己都无法完全组织清楚的话之后，听到另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我听到了，是这样吗？”这个动作，在生活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朋友间、家人间、同事间——它不是一个职业心理治疗师的专属行为，而是任何人际关系中最基础的“倾听—确认”动作。它不是把法官变成治疗师；它是把一个日常生活中所有人都可能对彼此做的事，嵌入到法官这个角色被严格限定的程序间歇中。

至于录音被用作上诉策略的风险，认领陈述段不计入庭审笔录、不作为证据使用——这一点在程序法上已经给了法院一个清晰的防火墙。如果上诉人声称“法官在认领陈述段说了什么表明他有偏见”，上诉法院应当直接以“此项陈述不在庭审记录中，不构成程序瑕疵”为由驳回相关主张。规则已经够用，不需要再加新规则。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质疑必须在此正面处理。对抗性悬置段规定陈述“不作为证据使用”，但如果当事人在这个不受质证约束的空间里，下意识说出了某种在法律上极其重要的信息——比如，一方在认领陈述段里说“妈临走前把他单独叫进去过，出来以

后他就把存折收起来了”——这句话在法律上是重磅的线索。按其性质，它突然之间成了一块从悬置段的例外空间里掉出来的、法官不可能假装没听到的证据碎片。认领陈述段的“不作为证据使用”规则，此时是否在要求法官做一件人类认知上不可能的事——人工遗忘？这个“认知泄漏”问题，是认领仪式在认知正义上面临的最严峻的质疑之一。

回应如下。第一，承认认知泄漏是一个真实问题——不是在认领仪式中首次出现，而是所有庭审机制早已面对、却从未诚实承认的普遍困境。法官在法庭外无意中读到过与案件有关的新闻报道吗？法官在庭前阅卷时对某一方产生过初步印象吗？宣告论的回应是假装这些都不存在——法官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别的都不看。但假装不等于解决。认领仪式没有制造新问题，它只是把旧问题暴露得更诚实——因为对抗性悬置段把“法官在正式审判之外听到了关于当事人的额外信息”这个早已存在的事实，从“不可见的背景噪音”升格为“看得见的、有时间有录像的程序事件”。

第二，在制度设计上，认领仪式不要求法官人工遗忘——那是不可能的。它要求的是透明化。如果法官认为在认领陈述段中涉及到的某项信息可能构成证据线索，应当在认领陈述段结束后、事实调查开始前，当庭声明——例如：“刚才原告在认领陈述中提到了一个情节，本庭注意到该情节可能与本案事实认定有关。但因该陈述不构成证据，本庭不会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若原告认为该情节在本案中有证明价值，可在后续程序中以合法证据形式提交。”这个声明做两件事：一是对双方当事人给出了明确的程序预期——认领陈述段不是变相的证据通道，任何想成为证据的东西必须走正门；二是对法官自己构成了一个制度性的自我约束——把“我听到了”这件事摆到明面上，总比假装没听到更不容易滑入无意识的预判。

（三）判决书附言：给“法律上没用”的话一个永久落点

一个认领驱动型的判决，不应当只有“本院查明”和“本院认为”。它应当在判决理由的末尾、主文之前，增设一段独立的附言。附言的作用不是补强法律论证，而是告诉当事人，他那些在法律上没用的话，在判决书里没有被抹掉。附言不是判决说理

——它不用“证据足以认定”“适用法律正确”等任何判决格式的语言。它用的是当事人的语言，回的是当事人的情感，封的是接住发生过这件事本身。

关于法律确定性的质疑——判决书附言中的情感化语言，是否会削弱法律规则的普遍性？是否会创造新的上诉争议点？

回应如下。附言在判决书中的位置——主文之前、说理之后——以及其明确的法律效力声明（“本附言不构成本案判决的事实认定与法律推理组成部分”），足以将其与判决的法律效力完全隔离。它不创造新的上诉争议点，因为上诉审只审查判决主文与说理部分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附言本身不产生任何可争议的法律后果。至于它是否会“削弱判决的普遍性”——恰恰相反。让判决书在严格的法律说理之外多出一段承认“有些东西法律装不下”的文字，不是在削弱判决的权威，而是在保护判决的诚实性，使它不致因假装自己是全部而自我掏空。

另一个更严峻的质疑是主观性暴政——附言的写作（如第三节的示例）明显需要较高的共情能力、修辞技巧与心理敏感度。在一个法官素养参差不齐的系统中，如何防止制度性封口沦为“碰上什么法官”的彩票？是否允许标准化模板？若允许，如何不沦为走过场？若不允许，如何保障制度公平？

回应如下。附言的质量差异，是认领仪式必须诚实承认的系统限制——它无法保证每一个法官都写出一样动人的附言，就像它无法保证每一个法官都写出一样高水平的判决说理。但“差异无法被完全消除”不等于“制度设计对此无能为力”。第一，附言的写作不应依赖法官个人的文学才华，而应被嵌入培训体系和文书范本指导——不是提供千案一面的填空模板（那是走过场的温床），而是提供结构化的问题清单：本案中，当事人最有代表性的情感表达是什么？在证据规则下未能被采认但值得被承认的叙述是什么？判决结束之后，法庭希望当事人记住的不是什么数字而是什么时候？法官根据清单写出简短的、具体的回答，而不是凭空发挥。第二，认领完成度评估中的败诉方回访——下文详述——会给每一份附言记分。那些写得苍白、千篇一律的附言，自然会因为回访中“判决书里那段话我读了没什么感觉”的低分而在绩效评估中暴露。差异本身不是失败——没有反馈环路的差异才是。

（四）评估体系中的“认领完成度”指标

如果法官的绩效考核里仍然只装着结案率、发改率这些数字，那么前面所有的制度设计都会在审限压力和结案焦虑下自行萎缩。因为花那十五分钟听当事人讲一个三十年前的故事，在结案率的账本上，是一个纯粹的成本项。认领仪式必须被计入成本—收益的考核框架，否则它在制度上就不存在。

本文建议在法官绩效考核中增设“认领完成度”指标，数据来自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结案后对当事人（尤其是败诉方）的简短匿名回访，包含三个核心提问——引导句为“无论你对判决结果的看法如何，下面我们想请你单独回想一下法官在庭审中对待你的方式”：①你觉得，法官有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把你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②你觉得，法官有没有真正听懂你？③如果你跟别人说“我今天在法院被认真对待了”，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二个源头是认领陈述段录像与判决书附言的随机抽查评估——不是个案中审查附言的文学质量，而是检查“附言是否针对本案的具体事实与情感表达作出了可识别的回应”（以区别于千案一面）。认领完成度的计算取以上两个源头的综合评分，换算为法官当期指标，赋予其占整体绩效考核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权重。

一个必须正面处理的统计学困境是：败诉方的回访回答，本身就被判决结果严重污染。一个感到判决“不公”的当事人，很可能把对判决实体的不满，泄漏到对“法官有没有听懂我”的评分上。回访数据可能测的不是认领完成度，而是判决满意度。这两个变量在统计学上会高度混缠。对此的回应不是在方法论上假装可以完美分离，而是通过两个技术动作部分缓解：第一，在回访问卷的设计上，通过引导句（如上）和问题次序将程序体验与实体满意度作出认知区隔——先问认领体验，后问对判决结果的看法；第二，在数据分析上，不只看全体均值，而必须单独提取子样本——“对判决结果不满但认领体验评分高于某阈值”的败诉方群体——进行分析。如果在足够大的样本中，这个子群体能够稳定存在并且不趋近于零，那就意味着：有一些当事人，尽管仍然认为判决是错的，但他们无法说“法庭没有接住我这个人”。而这正是认领仪式所追求的底线。

（五）效率、情感劳动与制度失败的生命线

针对资源与效率的质疑——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极其尖锐，十五分钟对抗性悬置段加上附言写作、加上回访评估，在审限压力下如何可能？认领仪式是否只能限于少量特定案件？

回应如下。首先，认领仪式确实不应也无须普适于所有案件类型。速裁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当事人无争议的确认之诉——这类案件中宣告已经足够。认领仪式的核心适用场景，是那些当事人之间存在深层情感冲突、且判决结果必然会让至少一方感到“被否定”的家事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劳动争议、行政诉讼。在这些案件中，法官若不处理情感层，那些未被接住的痛苦会在判后转化为长期的上诉、信访、拒不执行、乃至下一次纠纷的伏笔。认领仪式花掉的十五分钟，实质上是从后面省回来的——省掉了判后答疑的大量时间，省掉了当事人反复来访、反复申诉、反复纠缠的漫长消耗。这不是在做加法，是在做置换：把现在花在“事后灭痛苦的火”的时间，提前到“事前接痛苦的根”去。

另一个关联质疑是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确认式接住要求法官在庭审中投入相当的情感能量——倾听、共情、用当事人的语言回应。在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下，这是否会加剧法官倦怠，并反向导致更严重的司法人员流失？

回应如下。这个风险是真实的，不能也不必被否认。但必须同时看到：当前宣告机器下，法官承受的是一种不同的、同样沉重的心理负荷——面对当事人无法被消化的痛苦而无处可去、只能用“本庭已充分听取你的意见”这种程序话术把自己包裹起来的慢性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一样导致倦怠，而且因为没有制度出口，比明确的情感劳动更容易滑向职业冷漠。认领仪式不是在一片轻松的土地上增加劳动；它是在一片已经超载的土地上，把一种不可见、不可说、没有任何制度落点的隐性劳动，置换为一种有明确时段、有规则边界、有反馈落点的显性劳动。置换之后的负荷是否必然更重，本身是一个需要实证数据来回答的开放问题。但至少，认领仪式给了法官一个“我做的事被看见了”的制度接口——回访数据、录像抽查——而宣告机器从未提供过这个。

（六）走过场是最大的死法——以及制度如何逼出真诚

走过场，是认领仪式在制度化过程中最可能的死法。当一个法官把认领陈述段当成一项绩效考核任务来“完成”时，他可以面无表情地坐到十五分钟结束，可以在附言里粘贴一段事先拟好的、千案一面的标准话术——“本院充分听取了双方的情感陈述，对此表示理解”。这句话恰恰是最精致的宣告论，在“理解”的糖衣下继续宣告。当事人——尤其是那些对司法深度不抱期待的人——会迅速识破这种走过场的味道。那时，认领仪式不仅不能促成认领，反而会制造出比宣告更糟的后果：它把不被听到这件事，伪装成了一次被听到的完整表演。

这正是为什么认领仪式必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硬制度约束——嵌入法官考核指标、嵌入判决书格式规范、嵌入认领陈述段录像的随机抽查——而不能是软倡导。软倡导的认领仪式，恰恰就是最精致的宣告论。硬的制度约束，至少给了当事人在回访问卷上打低分的权利。那个低分本身，就是认领仪式自我修正的唯一引擎。认领仪式不假装自己能一次性解决真诚问题；它靠的是一个会让不真诚被记分、被比对、被追问的反馈环路，在制度的长跑中逼出真诚。

而在这个反馈环路运行两年后，如果败诉方的回访中反复出现同一类陈述——“那些附加的倾听环节，终究不过是让程序看起来更好看一点的装饰”——那才意味着，宣告论在认领仪式的内部重新复活了它自己，用“假装倾听”杀死了倾听。这就是本文最终极的证伪条件，将在第七节正式引爆。

六、镜像推演：一个案子，两种命运

（一）案例结构说明

老张（化名）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和若干存款。法定继承人有三：长子张甲、次子张乙、三女张丙。张甲长年与老张同住，负责日常照料；张乙在外地工作，每月寄钱；张丙嫁到邻省，与老张素来不和，多年来鲜有探望，但在老张病重住院的最后一个月曾赶来陪护。三兄妹对遗产分配各执一词，诉至法院。

本案例系根据多起类似继承纠纷的典型特征合成的虚构案件（composite case），用于在思想实验的框架下展示同一案件在有无认领仪式两种程序配置下的不同走向。它不包含任何真实个人信息，也不构成对任何特定司法管辖区的实证陈述。作为一种理论推演工具，composite case的效度不来自统计代表性，而来自它能否唤起读者基于其专业经验与生活观察的那种“是，我见过这种事”的结构性共鸣。以下一审认定三方均尽了不同程度的赡养义务，判决均等继承。判决实体正确，程序合法。分别展示本案在两种程序配置下的展开。

（二）配置一：传统宣告式庭审

张甲激动地从三十年前父亲让他辍学、供弟弟妹妹读书的旧事讲起。法官三次打断，要求他“只陈述与本案直接有关的事实”。张甲发现，他在这个房间里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姿势，是作为法官查案的信息源。他不是一个有权利让法庭听到他完整一生的人，而是一台等待被提取有用数据的机器。

张丙则在法庭上反复强调老张去世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这些年委屈你了”——这是一个在法律上毫无证明力的孤证。法官礼貌地听完，没有打断，也没有任何回应。在判决书里，张丙的这句话没有任何痕迹。判决书写了六个字：“无足够证据证明。”

一审判决书六千余字，是一篇完美的宣告论文本。它按照“原告诉称—被告诉称—本院查明—本院认为—判决如下”的格式，将三兄妹各自的故事分别压缩、蒸馏、重新拼装入法律逻辑的无菌室。没有人会在这份判决书里读到张甲的愤怒、张乙的愧疚、张丙的委屈。判决书最后一行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

张甲上诉了。二审调解中，三方达成了一个与一审判决几乎一样的分配方案。签完调解书，法官如释重负：“好了，事情解决了，以后还是一家人。”张甲走出法院时对妻子说：“我签字，不是因为我觉得公道了，而是因为我不想再来了。”

这不是公正感。这是“算了”。

更严重的是，“算了”之后，张甲心里发生的变化，被当前的所有司法评估指标系统地遗漏了。他不再期望法院能给他一个说法；他把那场官司总结为一句“法律就是欺负老实人的”。下一次如果他再被卷入纠纷，他不会说“我要找个好律师”——他会说“法律就那么回事，别指望它”。这就是宣告论在全社会范围内缓慢杀死公正感的细胞的过程：它用一次次“算了”，把原本对公正有渴望的人，训练成了对公正不抱期望的司法缴械者。

（三）配置二：嵌入认领仪式后的同一案件

现在回过头来，把认领仪式的三环机制嵌入本案，看看公正感在哪些节点会发生实质转向——但这一次，不让它滑入治愈童话。公正感即使在被认真托起的结构里，也是艰难的、有裂隙的、永远不可能完整闭合的。认领仪式不是要抹除这些裂隙，而是要证明，在这些裂隙里，当事人仍然可以感到“我不是被处理了一遍”——而这一点，宣告机器从未做到。

立案阶段。张甲在递交起诉状之前，收到了一份来自审判长的认领告知书。那封信用平实的语言告诉他：你马上要填的起诉状，是你用法律语言重写的删节版。在你交它之前，我们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正式开庭时，我们会留出专门的时间，让你用自己的话，把你和父亲这二十年的事在你自己的经验里是怎么被活过来的，说给我们听。没有人会打断你，没有人会追问你不懂的法律概念。你要做的不只是把你的纠纷塞进法律的格式——我们想听到，这件事在你自己的经验里，是怎么被活过来的。

张甲读到这段话时，心里发生了一个微妙但真实的位移。他第一次感到，这个即将审判他的法庭，不是一个随时准备把他切割成案由的机器。他想说的那些话——道歉、委屈、旧账——在程序的终点之前，有一个预定好的位置。但这个位移不是彻底的——他在把告知书放进包里时，也同时闪过了另一个念头：“说的好听，到时候还不是按法条来。”期待的升起与怀疑的存留，是同时在他心里发生的。

庭审阶段。认领陈述段开始了。法官对张甲说：“现在的时间是你的。你想从哪里说起都可以。”

张甲从三十年前讲起。他语无伦次，翻来覆去，有些地方明显自相矛盾，有些地方明显把张乙说成一个当年忘恩负义的人。法官只在他讲到一个关键情绪时，轻声确认了一次：“所以你觉得，这些年来，只有你一个人在扛这个家？”

只是一个问句。但它的作用，不在问出什么新事实，而在告诉张甲：你说出来了的、你说不清楚的、你吞吞吐吐却不愿咽回去的那些东西，在这个空间里，有人接住了。接住之后，法官没有做任何评价。他翻开了案卷，说：“好，现在我们进入事实调查。”

但法官接得并不完美。他在张乙发表一段关于“哥哥当年确实牺牲了很多但我也有自己的难处”的叙述时，短暂地看了一下手表。这个微小的动作被张乙捕捉到了。他在后来跟妻子通电话时说起这个细节：“我觉得他听我哥的时候比听我的时候认真。”这个感受未必准确——法官看表可能只是想起下午还有一个审限——但它落在张乙心里，成为了一道细小的划痕。在认领完成度的回访中，张乙给“法官有没有真正听懂你”打了七分，不是十分。

判决阶段。判决的主文与配置一完全一致——均等继承。但在判决理由的末尾，有一段附言。

“附言：在今天的庭审中，我们听到了你关于父亲临终前那句话的回忆。在证据规则下，这段回忆无法成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为它没有得到其他证据的佐证。但我们需要让你知道：在你的记忆里，那句话是真实的。那份真实，在你与你父亲的关系中成立。我们今天的判决，不能在法律逻辑中向那份真实让步，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你没有白来，你的那部分记忆，今天在这个法庭上被忠实地记录在了法官的心证之外——一个专门留给生活的位置。”

张丙读这段话时，确实哭了。她仍然没有得到比均等继承更多的一分钱。但她后来对律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不能被折算成任何审判质效指标，但它恰恰是认领仪式唯一想要的东西：“这个判决我可能一辈子都想不通——但我知道，法官听懂了我那天说的是什么。”

但她同时也对律师补了一句：“可我还是觉得，凭什么那份记忆在法律上就‘不能用’？他们既然承认我的记忆是真实的，为什么不能让这份真实改变一点什么？”这个追问没有被消解，也不应该被消解。她想不通，她也认领了。认领与质疑，在这个案例里同时成立。认领仪式没有治愈她，没有让她变成一个满意的当事人——它只是让她无法说出那句最致命的指控：“他们处理的只是案子，没有接住我这个人。”而这对认领仪式来说，已经足够。

七、与本栏《归感》《沉默塌缩》的分工，以及与贬降仪式的镜像对质

第四节已经与程序正义的 Voice、治疗性法学等六组近邻逐一对质。但还有两个占位没有被点名，其中一个就在作者自己的作品里。

“认领”这个动作，在本栏前作中已经两次出现：《公正如何被感受到：程序正义的“归感”危机》把“能否把判决所依据的叙事重新认领为我的经历”命名为归感；《活性塌缩》把“当事人主动认领公正的意愿”列为被完善化动作排挤掉的活性要素之一。若不说明分工，本文会被读成同一命题的第三次陈述。三者的关系是状态、病理与界面：归感命名的是一种状态（能不能认领），活性塌缩描述的是一条病理链条（系统越完善，越把维持认领意愿的要素挤出去），而本文提出的认领仪式是一个界面设计——它主张在判决书正文里为当事人说过的那段最痛的话设一个可查证的回响位置（制度性封口），把认领从一件靠运气发生的事，改造成一个有确定发生位置的制度动作。可裁决差别由此产生：归感理论预测归感缺失广泛存在但不指定发生位置；活性塌缩预测系统越完善缺失越严重；本文预测的是一个更窄、更容易被推翻的东西——**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判决书中出现实质性封口段落的案件，其当事人认领率显著高于无封口段落的案件。**若这一差异不存在，本文的界面主张失败，而前两篇的判断不受影响。这正是本文比前两篇更容易被证伪的地方，也是它值得单独成篇的理由。

第二个占位来自社会学：加芬克尔的“成功的贬降仪式”（Garfinkel, 1956）。加芬克尔分析了公开审判、开除、宣告有罪这类仪式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个人的社

会身份从一种类型转换为另一种类型——仪式的功能是让“他现在是另一个人了”这件事在公共场域中生效。认领仪式与它构成精确的镜像：贬降仪式由共同体完成、作用于被告的身份、目的是剥夺；认领仪式由当事人自己完成、作用于判决这份制度作品、目的是接纳。两者共享一个结构洞见——身份与意义的转换需要一个有确定发生位置的公共动作，不能靠内心自动完成；但它们的行动者、对象与方向全部相反。这个镜像不是修辞：它给出一条可裁决的推论——若认领只是贬降的反面，那么强化仪式的公开性与庄重感就应当提高认领率（贬降仪式的效力正来自公开与庄重）；而本文预测，公开性与庄重感对认领率没有独立贡献，起作用的是“我说过的那句话在文本里被回过”这一件事本身，哪怕它发生在一份没有任何仪式感的裁定书里。两个预测方向不同，可以用同一批案件区分。

八、与言语行为理论的对质：判决书是宣告式，认领要的是确认式

本文反复处理的那个事实——一份完全有效的判决为什么可以在生效的同时不被当事人认领——在语用学里有一个现成的、比心理学解释更硬的骨架。

奥斯汀与塞尔把言语行为分成几个基本类型，其中两类在这里承重。**宣告式**：说出即改变世界的制度状态，如宣判、宣布开庭、宣布婚姻成立；它的生效条件是纯制度性的——说话人有权限、场合与形式合规——而完全不包含受话人的接受。**确认式**正相反，它的成败取决于受话人是否被指认、被承接。

这一区分立刻解释了本文的核心现象，而且比说当事人心理没跟上解释得更彻底：**判决书是纯粹的宣告式文本。它的有效性在结构上不需要当事人认领，因此它可以在百分之百有效的同时百分之百不被认领——这不是判决的失败，而是宣告式言语行为的正常状态。**公正感之所以会在完美判决之后死去，不是因为法官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制度只配备了一种言语行为类型，却指望它完成另一种言语行为才能完成的事。

据此，本文所说的制度性封口可以被表述得更精确：它不是要求判决说理更充分——加厚说理只是把宣告式做得更厚，并不改变言语行为的类型——而是要求在宣告式文

本的内部，嵌入一个指向具体当事人的确认式片段：把他说过的那句最要紧的话，以可核查的方式在文本里回一次。

这给出本文最容易被推翻、也最愿意接受检验的一条预测：**其他条件相同时，判决书中嵌入确认式片段（点名回应当事人自述中的具体主张或经历）的案件，其认领率应显著高于仅增加说理长度的案件。**说理长度与确认式片段数可以分别编码、独立计量。如果两者对认领率的作用没有差别——即多写几段法理与回一句他的话效果相同——那么本文关于判决书文本界面的全部主张就失去了根据，认领仪式应当退回为一个纯粹的心理变量。

与加芬克尔贬降仪式的镜像对质已在上一节完成，这里只补一句它与本节的关系：贬降仪式是一套让人在共同体面前被重新定位为另一种人的仪式，其生效同样是宣告式的、不需要被贬降者同意。**认领仪式在结构上是它的反向操作，却不能沿用它的生效条件**——正因如此，认领仪式不能被做成一套仪轨性的强制模板（见下一节的禁区），而只能被做成一个留给具体内容的空位。

限度：言语行为理论处理的是话语的生效条件，不处理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本文借它划清判决为何可以有效而不可认领的结构条件，但并不主张确认式片段必然产生认领——它只是把认领从一件不可能的事，变成一件有条件地可能的事。

九、本文禁止什么

观测量。（1）“封口段落”：判决书正文中对当事人某一具体陈述的可识别回应（须指向该案特有的表述，格式化套语不计），由两名不知晓假说的编码者独立标注；（2）“认领率”：结案后当事人对“这份判决处理的是我经历的那件事”的自陈；（3）“程序满意度”：Voice 类量表得分，作为区分变量同时测量。

本文禁止以下情形出现。第一，禁止“封口段落与认领率无关，而程序满意度足以解释认领率的全部变异”：若如此，认领仪式只是 Voice 的一个别名，本文第四节第一组对质失败。第二，禁止“封口可以由模板生成而效力不减”：若把“本院注意到原

告陈述称……”做成强制字段后认领率同样上升，说明封口不需要实质回应，本文关于“可查证的回响”的要求被架空——这也是本文最担心的制度扭曲形态。第三，禁止把认领仪式用作对判决结果的补偿：若某法院在实体处理趋于草率的同时提高封口段落覆盖率，并以认领率上升自证，那属于对本文主张的滥用；本文明确要求封口段落只在实体审理无可指摘的前提下被评价。

本文不主张什么。 本文不主张判决书应当变长或变得抒情——封口是一次精确的指认，不是说理的加码，第五节给出的样例均在两百字以内。本文不主张认领可以被制度保证：本文只主张它有一个确定的发生位置，而这个位置目前在文书体例里根本不存在；给出位置不等于给出结果。本文不主张所有案件都需要封口：在当事人未作实质陈述、或争议纯属法律适用的案件中，封口无对象，强行设置即沦为套语。

十、代结语：认领的边界与能走的最远

本文一路追到宣告论的结算极限处，从那个极限处的三重耗竭里逼出了对抗性悬置段、确认式接住、制度性封口这三个不得不发生的新结构。每一项机制都不是被预先设计好再指派给某道裂缝的答案——对抗性悬置段逼出了输入—反馈断裂的系统扭曲，这个扭曲逼出了确认式接住；确认式接住作为纯当下、纯口头的接住，在司法只承认文本的公共记忆系统里面面临“发生即被抹除”的结构性困境，这个困境逼出了制度性封口。它们的制度化出口——诉前告知书、庭审认领陈述段、判决书附言、认领完成度评估指标及其回访与录像抽查——共同构成了一个可被操作化反思的完整框架。

认领仪式能走到的最远，是什么？它不保证当事人会变得更善良、更理性、更守法。它不保证败诉方会满意于判决，甚至不保证他会“心服”。它只保证一件事：当事人从法院走出去时，不再有理由说“他们处理的只是案子，没有接住我这个人”。如果他仍然感到未被接住，认领仪式给了他一个制度性的回访问卷，让他用低分来表达这一次也仍然是走过场。如果他走进法院时带着的期待没有被完全满足——那从来就不是认领仪式的承诺。认领仪式不承诺满足；它只承诺不丢弃。

认领仪式不是完美的，但它给自己的失效预留了被检测、被反馈、被修正的可能性。这种“为自己的失败预设一个出口”的结构，正是宣告机器从未拥有过的。宣告机器没有这份诚实——因为宣告机器的全部合法性，建立在“只要判决正确，公正就已经实现”的信心之上，而承认失效就等同于承认这个信心是虚构。认领仪式的合法性恰恰不在它不会失效，而在它敢把失效叫出名字来。

由此引向本文的证伪条件。如果在一个设置了完整认领仪式机制（对抗性悬置段、制度性封口、含回访与录像抽查的认领完成度评估指标）的试点法庭中，经过至少两年的运行、法官接受过系统培训、回访样本量足够大之后，败诉方在结案后的匿名回访中仍然普遍地、反复地出现下面这种性质的陈述——“法官确实给了我说话的机会，判决书里也确实写了回应我的那段话，但在我心里，那个判决，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们’的判决，不是‘我’的判决。那些附加的倾听环节，终究不过是让程序看起来更好看一点的装饰”——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就是错的。

那将意味着，宣告论在其结算极限处的耗竭，并非公正感危机的根源——或者，即便它是根源，在判决终局性的不可协商框架之内，没有任何制度装置能接住这个耗竭。认领仪式的制度化尝试，也只不过是多了一层更精致的宣告。宣告论用“假装倾听”重新复活了自己，而这次复活后的宣告，将比旧宣告更难被诊断——因为它有录像、有回访、有绩效考核，有一整套“证明我们在倾听”的制度外衣。

在那个证伪时刻到来之前，认领仪式依然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制度提案。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它坦诚——坦诚到把自己的死法都提前说了出来，坦诚到不假装公正感是一件可以被制度轻松接住的东西，坦诚到在判决这个最硬、最不容置疑的终局里，给那些法律装不下的东西，留了一段文字落点的位置。

注释

- [1] 材料说明：本案例系根据多起类似继承纠纷的典型特征合成的虚构案例（composite case），旨在进行思想实验性质的例示与镜像推演。案例中的当事人姓名与可识别信息均已作匿名化处理，不包含任何真实个人信息。composite case作为一种理论推演工具，其效度不依赖统计代表性，而依赖其能否唤起具有相关专业经验或生活经验的读者“是，我见过这种事”的结构性共鸣。

- [2] 本文对Tyler (1990) 程序正义模型的援引, 限于其“voice” (表达机会) 与“dignity/standing” (尊严与地位确认) 两个核心维度的意涵, 用以在与认领仪式的对质中指出关键的区分面。Tyler模型中其他要素 (如中立性、可信任动机等), 不在本文的比较范围内。
- [3] 此处对治疗性法学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的引述, 集中于Wexler和Winick (1996) 早期所主张的“法律程序应促进当事人心理福祉”及法官角色在程序中的治疗化倾向。治疗性法学其后的实践转向 (如问题解决型法庭的扩展、恢复性司法程序与治疗性法学的交叉等) 不在本文的比较范围内, 但其中与认领仪式最危险的重叠——恢复性司法作为治疗性法学的实践载体——已在第四节 (五) 中单独处理。
- [4] 本文对罗伯特·科弗 (Robert Cover) 叙事法学的援引, 限于其1986年论文《暴力与语词》 (“Violence and the Word,” 95 Yale Law Journal 1601) 中关于法律通过其自成一体规则压制多元叙事、在“充满疼痛与死亡的世界”中运作的核心论断。科弗在该文中对“法律暴力” (legal violence) ——国家通过判决合法地实施暴力——的关注, 与叙事法学后来将其经典化为“叙事法学开创者”的路径不尽重合。本文在“叙事法学传统”中援引Cover, 是遵循了学科史的通说, 但同时也意识到, Cover本人的理论关切超出了叙事法学的范畴。本文与Cover对质的具体内容仅限于上述关于法律压制生活叙事的特定诊断, 不涉及科弗关于犹太法解释学与“规范世界” (nomos) 生成的更完整体系, 亦不将其等同为叙事法学在实践论层面的代言。
- [5] 法官作为“自动售货机”的意象, 出自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经济与社会》 (1922) 对极端形式理性化司法的描述, 后被广泛用以指代概念法学的机械裁判观。本文在此隐喻意义上使用, 不将其视为对韦伯理性化命题完整意涵的精确援引, 仅作为一个被法学史普遍承认的修辞性历史锚点。
- [6] “认领仪式”“宣告论”与“确认式接住”是本文为分析现代司法中公正感生成结构而提出的操作性构念, 并非对任何现行司法制度的描述, 亦非对既有学术术语的沿用。在汉语法学既有语境中, “认领”一词通常指对遗失物、遗体或无因管理中的占有取得等 (参见民法典第314条以下及相关民事程序规定)。本文借用“认领”一词来意指当事人在心灵中将一个外部权威的判断认作与自己有关的心理事件 (psychological appropriation), 与既有法律术语的日常含义存在修辞性差异。这一借用的正当性, 不在术语传统, 而在本文所论证的那个现象本身——当事人在宣告机器中被剥夺的, 正是这种“把判决认作自己的一部分”的心理位置——此前在汉语中缺乏一个专门的命名。
- [7] 本文中出现的“认领告知书”文本 (第五节) 及“制度性封口”判决书附言示例 (第三节与第六节) 均为作者为直观展示制度接口而模拟的构想性文本, 不源自任何真实的司法文件, 也不代表对法官文书写作的具体要求。

参考文献

Cover, Robert. 1986. "Violence and the Word." Yale Law Journal 95: 1601–1629.

Luhmann, Niklas. 1989.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J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ry, Sally Engle. 1990.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yler, Tom R. 1990.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xler, David B., and Bruce J. Winick. 1996. Law in a Therapeutic Key: Developments in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1922.)

Garfinkel, H. (1956). Conditions of successful degradation ceremon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1(5), 420–424.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arle, J. R.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种读法 · 网页长文 · 在线 PDF 翻页 · PDF 下载

[返回 高鹏 全部作品 →](#)

本文由作者借助 SDE 金点子发生器完成思想拓展与成稿：发生器产出作为思想实验与观点探索提供，用于拓展思路、激发思考，不构成正式学术研究成果或事实性结论；正式使用请自行核验并遵守学术规范。